

弗洛姆文集

改革出版社

我相信人有实现自己的权利

现代人摆脱了中世纪的束缚,却没有能够自由地在理性与爱的基础上营造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弗洛姆文集

冯 川 主编

改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弗洛姆文集/(美)弗洛姆著;冯川等译, - 北京:改革出版社, 1997.7

ISBN 7-80143-031-X

I. 弗… II. ①弗 ②冯… III. 弗洛姆-文集
IV. 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7915 号

责任编辑:张艳华

封面设计:刘梁伟

监督印制:柏争英

弗洛姆文集

冯 川 等译

改革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德里北街 23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京东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1/32 18.5 印张 480 千字

印数:20000 册

ISBN 7-80143-031-X/B·002

定价:29.80 元

《弗洛姆文集》编者序

弗洛姆 (Erich Fromm, 1900 - 1980) 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他的众多著述的广泛传播, 本身就证明了他的思想具有广泛的影响和不容忽视的意义。然而, 尽管影响深远, 这位思想家的思想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许多人都或多或少读过一些他的著述, 却感到一时难以对他形成一个整体的印象。之所以如此,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涉及的领域太广, 身分比较复杂。他既是弗洛伊德的学生, 曾长期从事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 并根据自己在这领域的独特发现, 对弗洛伊德的思想作出过重大修正; 又是马克思的信徒, 率先对马克思的思想作了新的阐释, 并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分, 致力于社会的分析和批判。他是彻底的理性主义者, 试图根据理性的发现和理性为自己规定的任务, 描绘出健全的个人和健全的社会, 促进新人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 同时, 他又具有明显的宗教倾向, 不仅背负着基督教文化背景中的救世情结, 而且从东方神学中获得过打破精神枷锁的启示。以现代学术分科的眼光, 弗洛姆可以同时被说成是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伦理学家甚至宗教思想家。但从其一生的倾向看, 他其实只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 ——也就是说, 是一位根据自由

而独立的主张，从个人的角度（以及个人与传统和未来价值的关联）对社会进行分析和批判的学者。

弗洛姆的社会分析有他的独到之处。例如，他认为与19世纪相比，20世纪社会生活方式的一大特征是拼命消费，就与韦伯把聚敛财富投入再生产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说法有所不同。在弗洛姆看来，聚敛固然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典型特征，消费也同样代表着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并且还更具20世纪的特征。消费刺激着生产，生产扩大着消费。如果没有消费，生产便必然陷入停滞。（这一点恰恰是只关心扩大生产的现代社会所不情愿的。）为了扩大生产，现代企业和现代社会必须不断开发新的消费需要，而不管这些需要究竟对有益还是有害。五花八门的消费给人造成的最大幻觉是：消费者自以为是在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财产和享受，实际上却浑然不觉地沦为消费的奴隶。盲目的消费并没有给人带来幸福，人们从中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不断地刺激起更大的、永远也得不到满足的消费欲望。在疯狂而盲目的消费中，消费对象和消费者本人都被“物化”了——人成了社会这个庞大的消费和生产机器上的齿轮和润滑剂。

当然，弗洛姆并没有一概地反对消费。“只要人的生活水平低于代表人格尊严的生存水平，人自然会需求更大的消费。而且，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随着对美好食物、艺术品和书籍的需求增加，人需要更多的消费也是合情合理的。”^①——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消费的需要，已经和人的真实需要失去了联系。”^②在令人头晕目眩、应接不

①② 见《健全的社会》，孙恺祥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6页。

暇的消费面前，人已经完全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消费已经成为现代人病态的非理性需要。人们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他的消费完全跟着社会潮流和广告商的宣传走。他今天购进一辆时髦的汽车，明天又毫不犹豫地把它卖出，以便去追求更为时髦的品牌。他和他的消费对象之间，并没有任何情感上的联系。（相比之下，19世纪的人在不得不告别自己的财产——例如一幢居住了多年的房子时，心中还不禁会涌起某种惆怅和依恋。在这样的意义上，他和他的消费对象之间，还不乏某种人性的联系。）同样的情形也见之于“爱”的消费：爱也成了消费；消费者必须频频更换消费对象，才能不断地刺激起新的消费欲望。“同‘爱’的对象保持的关系过长，便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作法。‘爱’被认为是一种短暂的性欲，应当立即得到满足。”^①——随着人成为“人格市场”上的商品，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成了消费和交换。每个人都是“一包东西”，一包由他的交换价值（他的外貌、学历、地位、收入、已经取得的成功和未来的成功机会）混合而成的“包裹”。人人都想使自己这包“包裹”卖上更好的价钱，同时又希望和那些价格稍高的“包裹”打交道，以便通过接触，寻找获利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消费和交换显然大大加速了人的物化。

与上述情形相应的是：现代人在所谓“变得更加现实”的假相中，实际上却完全失去了对现实的把握。现代人追求享受，主张及时行乐，能够精明地计算利害得失，但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却往往显示出惊人的无知。——“这些重要

^① 《健全的社会》第131页。

的事情包括生与死、幸福与痛苦、情感与严肃思想的含义。现代人将人类生存的整个现实掩盖起来，用人为的虚饰和虚假的现实来代替真实的生活，这跟野蛮人用土地和自由来换亮晶晶的玻璃珠子的做法并没有多大的差别。”^①和霍妮一样，弗洛姆也把这种虚假的认同说成是“异化”^②，不同之处在于，弗洛姆对“异化”批判，其范围可以说无所不包，涉及到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尽管“异化”这个概念容易显得大而无当，它在弗洛姆那里的根本含义，却是指人在生活中丧失了理性、信仰与爱。在弗洛姆看来，理性和智力是两种不同的东西：现代人可以精明地计算每一笔交易的得失（不乏智力），同时却完全不考虑明天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没有理性）。这种目光短浅在一定意义上是由现代社会生活的性质造成的。——“由于没有人自始至终完成整项工作，大家都只是做工作的一个部分，又由于事情包罗万象、人事机构过于庞大，人们便很难有一个通盘的认识，对于现象下面的规律和法则也不易看见。无论一部机器还是一个国家，我们的聪明才智都只能操纵其中的一个部分。”^③——这种情形，极大地破坏了人的理性，因为理性只有在能够涉及整体的情况下才能形成和发展。此外，理性与整体的关联还必须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因为一旦失去对生活的具体感受，人的现实感也必然随之而消失。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是亚里斯多德。他认为一个城市的人口如果超过了

① 《健全的社会》第136页。

②③ 参看我为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所写的中译者序，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一定的数量，这个城市就变得不再适宜于居住。弗洛姆则进一步指出，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现代人，由于渴望放弃自由，屈服于非人格的国家机器和“无名大众”，在丧失了独立意志的同时，也丧失了清醒的理性。

现代人对自由的逃避，一直是弗洛姆特别关注的问题。按照弗洛姆对人类历史的看法，现代人正处在走向自由的中途——“现代人摆脱了前个人主义社会的束缚，却未能获得个人自我实现这一积极意义上的自由，这就是说，他的理性、激情、感觉和潜能没有能够得到表达。自由给人带来独立和理性，同时却使人变得孤立无依，导致了焦虑和无能为力的感受。这种孤独感是无法忍受的，个人被迫面临抉择：要么从自由的沉重负担中逃脱，进入一种新的依赖并屈从于它；要么前进到积极的自由，即那种建立在人的独特性和个性特征基础上的自由。”^①如果说，发表于1941年的《逃避自由》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对纳粹极权主义为什么能够产生的思考，那么，该书对逃避自由的本体论分析，却具有更为广泛的人学意义。在弗洛姆看来，自由的含义是暧昧的；摆脱束缚的自由仅仅是一种消极的自由，积极的自由则意味着自觉地去实现个人的潜能。然而，不管是哪一种自由，都必然给渴望实现它的个人带来孤独、焦虑和恐惧。更进一步讲，这种恐惧源于与生俱来的分离感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不同于他人的“我”时，孤独和焦虑就已经为未来的顺从埋下了伏笔。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若不能正确地解决自我的认同和定向（这需要理性和勇气），便只

① 《逃避自由》英文版序言。

能走向虚假的认同和定向，屈服于有人格和无人格的非理性权威（有人格的非理性权威不妨以极权主义国家中的希特勒为代表，无人格的非理性权威不妨以民主国家中的国家机器的“无名大众”为代表）。——换句话说，顺从源于人的天性，逃避自由的倾向深深植根于人的处境。在这种情形下，个人能够作出的选择，仅仅是决定把自己交给形形色色的非理性权威（包括消费时尚和大众趣味），还是把自己交给理性为自己规定的生活目标和人生使命。

当然，弗洛姆也清醒地看到：个人不可能在脱离社会的情况下去获得虚幻的自由和自我实现。毋宁说，那种试图摆脱一切束缚的自由，往往只能释放出种种非理性的破坏力。在弗洛姆看来，现代人只是在人类社会走出了中世纪（即所谓前个人主义时代）之后，才获得了自由和自我实现的社会可能。而要进一步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也只能依靠社会提供的有利条件。——不过，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复杂：面对社会，个人并不是纯然被动的“物”，只能受社会的支配；相反，社会的进步倒是只能以个人的成熟为条件。一味地顺应社会，并不见得就能有益于社会；相反，个人对社会的批判，有时倒能为社会做出贡献。易卜生曾说：个人要想对社会有益，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展自己的本质。弗洛姆则认为：精神分析的目的，不应该是帮助个人去顺应人群，而应该是帮助个人重建自己的理性。

在弗洛姆看来，社会可以有两种功能：它既可以促进人健康地发展，也可以阻碍人的进步。“实际上，大多数社会都具有这两种功能。问题只是，社会对人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的程度和方向怎样。”^① 在带有思想自传性质的《超越幻相之锁链》中，弗洛姆更进一步指出：“我相信，社会既有促进的作用，又有阻碍的作用。人只有在与他人的合作中，在工作的过程中，才能发展自己的力量，他也只有在历史的过程中才能创造自己。——然而，直到今天，许多社会都只为少数人利用多数人的目的服务。为了不让多数人的能力得到发展，少数人不得不使用自己的权力来愚弄和威胁大多数人（因而也间接地愚弄和威胁了他们自己）。因此，社会通常是与人性，与对每一个人都有效的普遍规范冲突的。只有当社会的目标与人性的目标一致时，社会才不再使人残缺，不再增加罪恶。”^②

从这些话不难看出，弗洛姆的社会批判，是一种人学立场上的社会批判——其出发点是维护人、维护人的自由和理性、维护人自我实现的权利。但是，要维护人的权利，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人的需要。否则就可能把人的病态需要当成竭力维护的东西。不同于以往的人道主义者，弗洛姆并不抽象地谈论人性，而只是试图正确地理解人性——他的大部分工作，都致力于揭示人的现实需要。作为新弗洛伊德学派的代表，弗洛姆始终坚信：未来健全的社会只能建立在对人性的正确认识上，而在精神分析出现并获得发展之前，人的自我认识往往是不完整的。他甚至批评马克思对人性的看法过于乐观——“马克思低估了人类感情的复杂性，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性有着自身的需要和规律，这些规律同影响历史进程的

① 《健全的社会》，第 57 页。

② 《超越幻相之锁链》，第 177 页。Trident Press, New York, 1962.

经济状况在不断地相互作用。”^①——“马克思以为，只要把人从被剥削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就会自动产生出自由的、互相合作的人。”^②——“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强调必须实现社会经济的变革，却忽视了人的内心变化的必要性。”^③不过，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马克思是最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家：马克思的学说继承和发展了“把人视为社会发展之目的”的伟大传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为人的自我实现做出了贡献。

马克思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在这方面，弗洛伊德是无法与之相比的。……但如果因为弗洛伊德未能达到马克思的高度而忽视弗洛伊德的重要性，那却是十分幼稚的。弗洛伊德是真正的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他对无意识心理过程和性格特征动力学性质的发现，是对人学的独特贡献，这一发现已经改变了人的未来前景。^④

作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学说的继承人，弗洛姆的人学新贡献主要表现在：他进一步研究了人的需要，并通过对这些需要的描述，为未来的社会提供了改革的方案。在《健全的社会》中，弗洛姆指出：“人学的最终任务便是对可以称之

① 《健全的社会》，第213页。

② 同上，第215页。

③ 同上，第219页。

④ 《超越幻相之锁链》，P. 12页，Trident Press, New York, 1962.

为‘人性’的东西作出正确的描述。人们通常所说的‘人性’，实际上只是人性的众多表现形式之一，而且常常是那种病态的表现形式。”——这就是说，面对人的种种需要，人学的任务就是透过假相，揭示出人的真实需要。按照弗洛姆的看法，这些需要主要是：一，联系的需要；二，超越的需要；三，寻根的需要；四，认同的需要；五，定向的需要。（其中每一种需要都既可以获得真实的满足，也可以获得虚假的满足。）——在《健全的社会》（以及其它一些著作）中，弗洛姆从现代人的生存状况出发，对这些需要作了全面的论述。他的论述，重点不在人与动物共有的需要如饥饿、性欲等方面，而在人作为人的独特需要方面。他认为：自从人脱离了自然状态和动物状态后，他便因为失去了那种天然、和谐的联系而感到焦虑、紧张；自我意识的觉醒使人感到痛苦，人知道自己的软弱、无助和终有一死，他必须在倒退与前进之间，在退回到动物性生存与达到人性的存在之间作出自己的选择。倒退的选择固然也可以消除焦虑，但却无法实现满意的人生。——“精神健康的人与神经症患者都受到需要的驱使去寻求答案，唯一不同的是，与后者相比，前者寻求的答案与人的整体需要更加一致，因而更有助于发挥人的力量，使人获得快乐。”^① 他认为：

脱离文化模式常轨的人与顺应文化的同胞一样，都是为了寻求解答。他找到的解答比文化提供的解答或者好些，或者坏些——但对于人类生存所

^① 《健全的社会》，第22页。

引起的同一基本问题来说，总是一种解答。……从这一意义上讲，一切文化都是宗教性的，而每一种神经症也都是一种个人形式的宗教。的确，产生精神病以及潜藏在艺术与宗教背后的巨大能量，绝不能看作是受挫或升华的生理需要的产物；这些能量是人了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努力。如果说理想主义是指满足人的特殊需要、满足那些超越有机体的生理需要的奋斗精神，那么，人人都是理想主义者，人人都无法不当理想主义者。所不同的是：一种理想主义是好的、完善的解答；另一种则是坏的，具有破坏性的解答。^①

在对人的生存状况作了上述判断后，弗洛姆进而分析了人的五种需要。

一，联系的需要。脱离了自然状态和动物状态的个人必须建立起一种新的联系来取代从前那种受制于本能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通过“顺从”和“控制”的方式来实现，正是这两种方式导致了屈服和主宰、受虐与施虐的倾向。但是，“不论顺从还是统治，从本质上讲，都是一种共生关系。这两种人都失去了自己的完整性与自由。他们相依为命，互相获得生存的力量，满足相互亲近的渴望，但却缺乏内心的力量和自主的精神，因为他们没有自由和独立；而且，他们还不断地受到自觉和不自觉的敌意的威胁，而这种敌意正是共

^① 《健全的社会》，第 23 页。

生关系的必然产物。”^①“人身上只有一种感情能满足人与世界结合的需要，同时还能使人获得完整性和个性感，这种感情就是爱。爱就是在保持自我的独立与完整的情况下，与自己之外的他人或他物结合为一体。”^②弗洛姆在许多地方都论述了爱的意义，但是，只有把爱视为人最基本的需要，才不致用爱的赝品混淆了真正的爱。

二，超越的需要。人不能安于其被动的生物性（生死不由自主、本能不由自主），他必然要设法超越存在的偶然性和被动性。这种需要，既可能迸发为创造的需要，又可能迸发为破坏的需要、毁灭的需要。“对于超越的需要还有另一种回答，即，如果我不能创造生活，至少我总能毁灭生活。毁灭生活也使我超越了生活。……毁灭意志的庞大力量正像创造的动力一样，也来源于人的本性。……我们说，人能发展自己潜力去爱、去思维，并不意味着我们相信了人性本善的天真说法。破坏性是人的次要潜力，只要有人存在，就有这种属性。……但是，破坏性只是创造性的替换物……当创造的意志无法满足时，破坏的意志就会抬头。不过，满足创造的需要会导致幸福，而破坏则会对人，尤其是破坏者本人，造成痛苦。”^③

三，寻根的需要。寻根的需要是精神上寻求安顿的需要。“人诞生为人便意味着他脱离了自然的家，割断了与自然的关系，这种继绝使他感到害怕……只有当他找到新根之

① 《健全的社会》，第24页。

② 同上，第25页。

③ 同上，第29—30页。

后，他才在这个世界上感到安全和自在。如果我们在人身上发现了一种深切的渴望，渴望不割断与自然的联系，不割断与母亲、与血缘、与土地的感情，我们难道会感到奇怪吗？”^① 不过，在弗洛姆看来，“没有从血缘、土地关系中解脱出来的人，不是诞生完全的人；他没有能力去爱，去思维；他无法从人的现实存在中体验自身和自己的同胞。”^② 弗洛姆认为，寻根的需要是一种深刻的需要，它既可以退化为对母亲的固恋和对父亲的崇拜，也可以成熟为母亲式的良心和父亲式的良心。母亲式的良心主要表现为爱、平等与宽恕，父亲式的良心则表现为正义、理性和纪律。“总地说来，父亲情结的积极方面包括理性、纪律、良心和个性；消极方面则是等级、压制、不平等和顺从。……不过，世上不仅有父亲般的良心，也有母亲般的良心；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去尽职责，也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去爱，去原谅——爱自己，爱别人，原谅自己，也原谅别人。”^③ 在弗洛姆的论述中，这种成熟的、具有理性意味的良心显然与基督教人道主义传统中积极的方面有关。

四，认同的需要。认同的需要是一种获得自我身分感的需要。“人是可以说‘我’并知道自己是一个独立个体的动物。……如果他无法获得这种身分感，他就不可能保持神经的健全。”^④ “西方文化发展的方向就是创造个人充分体验个

① 《健全的社会》，第30页。

② 同上，第46页。

③ 同上，第37页。

④ 同上，第48页。

性的基础。……但是，只有少数人获得了这种对‘我’的新体验。对大多数人来说，个性不过是一个门面，在它后面隐藏着失败，即一种无法获得个人身分感的失败经验。”^①获得自我身分感的需要是一种基本的需要。“有时，这一需要比肉体生存的需要还来得强烈。人们宁愿冒生命危险，放弃自己的爱，舍弃自己的自由，牺牲自己的思想，为的就是成为群体中的一员，与群体协调一致，并由此获得一种哪怕是想象的身分感。——这样的事实，难道不是再明显不过的吗？”^②

五，定向的需要。定向的需要是认识和理解的需要，同时也是行动和献身的需要。“人具有理性和想象力的事实不仅使他有寻求自我身分感的需要，而且也使他感到，在这个世界上，他需要理智地确定自己的取向。……他的理性发展得愈深远，他的定向系统也就愈完善，愈接近现实。但是，即使人的定向心境完全是虚构的，也满足了想勾画出一幅他认为有意义的图画的需要。无论他信仰图腾动物的力量、雨神的力量，还是相信他所在种族的优越性和命运，他的定向需要都得到了满足。”^③换句话说，“人需要一种定向参照系，这种需要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比较基本的，那就是（无论如何）得有某种定向参照，而不管这种参照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只有当人有了这种满足主观愿望的参照之后，他才能正常地生活。第二个层次是，人需要以理性来把

① 《健全的社会》，第49页

② 同上，第50页。

③ 同上，第50页。

握现实，客观地理解世界。但是，发展理性的需要不及发展定向参照的需要那么急迫，因为对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幸福和安宁，而不是精神的健康。”^①——“人不仅需要某种思想体系，也需要为之献身的目标；有了这个目标，他的存在以及他在世界上的地位才具有意义。不管上述系统的内容怎样，它们都对人的需要作出了反应。只有通过对不同宗教的分析，我们才能看到哪些较好地解答人对意义和献身目标的追求，哪些的解答较差；而好坏之分，则总是从人性和人的发展的角度来考虑的。”^②

——这些分析，基本上代表了弗洛姆的人学立场。弗洛姆自己也认为，它们是“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关键。弗洛姆的社会批判，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当然，作为人性的剖析者和社会的批判家，弗洛姆不仅始终依靠清醒而冷峻的理性，而且也始终依靠西方文化传统对人的价值的高度肯定。在当代西方思想家中，弗洛姆的思想有他独特的地位。不同于荣格等思想家具有的希腊和东方倾向，弗洛姆主要承继的是犹太—基督教思想传统，此外，他的个人气质中也有明显的救世倾向和“弥赛亚”情结。对弗洛姆的思想应该作什么样的评价，他对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社会可能有什么样的积极和消极意义——这些问题，是需要专门研究者作进一步研究的。

以上概括，仅仅涉及到弗洛姆思想的一个方面。为了全面了解弗洛姆的思想，我们编选了这本《弗洛姆文集》。文

① 《健全的社会》，第 51 页

② 同上，第 52 页